

胡友信：写八股文写出了名堂

◎ 两浙人物 □ 朱炜

胡友信，明正德十一年(1516)生，字成之，号思泉，湖州人，家居德清老县城北界文昌坊。他少负鸿才，博通经史，学有根柢，明嘉靖二十八年(1549)举人，明隆庆二年(1568)进士，著有《天一山稿》、《明史》“文苑”有传。

胡友信能青史留名，列入“文苑”人物，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的制义文章独树一帜，影响深远。

科举取士，主要考试内容是儒家经义，以四书五经文句命题，阐释义理。所谓制义，要求考生讲明所学的某种经书中的某项道理。制义文章俗称八股文。明代举子业最擅名者，王唐归胡也。前则王守溪(鏊)、唐荆川(顺之)，后则归震川(有光)、胡思泉，此四人为一代之冠。无论王、唐，还是归、胡，都企图以古文笔法来提高八股文的写作。胡友信，与王守溪、唐荆川、归震川并称“明四家”。此外，有将胡友信与杨起元、汤显祖、薛方山、瞿景淳等先后齐名的另四位，合称“明八家”。汤显祖以戏曲著名，八股文也卓然可称，曾指出：“时文字能于笔墨之外言所欲言者，三人而已，归太仆(有光)之长句，诸君燮之绪音，胡天一(友信)之奇想，各有其病，天下莫敢望焉。”其中，诸燮是余姚人，上承归有光，下启胡友信。能与笔墨之外言所欲言者，非八股文之功能，而是散文、诗词等文学作品之特点，可见归有光、诸燮、胡友信的时文与古文已相融合。清代学者高塘在《明文钞》序中说：“文至隆(隆庆)、万(万历)，变化、治之老法而行之以机，变正、嘉之朴实而运之以巧……首曰胡思泉，铜墙铁壁之称，前人以之追配太仆(归有光)也。”

胡友信，处明嘉靖、隆庆之间，他的文章原本经术，沛然出之，雄深博大，虽无长篇大论，局斂而气自开拓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，卓然自立。胡友信的八股文具有理真义精的特点，虽受时代风尚的影响，他不再恪守传注，对经文的理解也参入己意，又善用机法，以文句齐整、音调铿锵、手法新奇见长。胡友信的文章气势或不如归有光宏大，但说理比归有光显豁通达，用意比唐顺之奇特，因他注重炼局炼意。

胡友信的八股文特征之一是其文无不肖题。作八股文，要讲题理、题神，因为各题都有其形貌，所作之文必与之相称，



胡友信画像

而后才能肖题。他的代表作《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》，便是八股文肖题的典范。

胡友信的八股文特征之二是布局宏阔，精神一气贯注，使其文具有浑浩流转之势，而又能出经入史，典雅纯正。他的代表作《书同文行同伦》，便是这方面的范例。

胡友信的八股文特征之三是融液经史，以古文为时文，重视移植古文的写作方法，对传统的八股文体式有所突破。他的代表作《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一章》《天下有道 一章》，非常人所能及。

因此，胡友信的八股文被选入明代各种选本，很多士子都以胡友信的文章为范本，揣摩学习，以图仕进有成。及至清代，仍有不少读书人作文宗法之。

可以说，胡友信大半生都用在钻研制义、考取功名上，进士及第后，即赴任广东顺德知县。他在任上政绩斐然，显示出很强的行政管理水平，不能不说长期的八股时文写作对他确实起到了培育作用。他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，立身处世，皆以儒家道德价值观规范自己。他治县如同治家，修整塾壁，城池、学校咸为更新，又

亲自督课邑中子弟，广施教化，后学撰有《名宦思泉公投功祠记》云：“公自昔工于制时，独解真詮，朔望进诸生于明伦堂，授以玄奥及所自制，以示程式，比师生入见于公署后堂，命坐听讲，诿以别义十数章，寔寡忘倦。”明隆庆六年(1572)，胡友信卒于官，士民立祠奉祀，归葬德清吴美山之阴蒋湾圩。对于胡友信其人其事，清代诗人罗惇衍有咏史诗云：“大邑治来等小鲜，以宽为治以严先。萑苻迹敛惊雷鼓，粟米欢输却月钱。文婉王唐皆卓卓，养成子弟亦翩翩。有明经义谁宗主，绩懋歌时尚伟然。”

明隆庆、万历后，文学化了的八股文成为文坛的主流，许多名家的八股文被学界与古文等而同视。遗憾的是，胡友信后期做了一县之父母官，陷于冗务之中，无暇充分展现个人文学才华，以致在古文创作上较少建树。

胡友信虽非德清胡氏始迁祖，但胡氏后人以胡友信起家，是为书香门第的标志。胡友信孙辈中有胡公角，明天启四年(1624)举人，肆力史、诸子百家之文，振笔有胡友信之风；又有胡麟生，明崇祯元年(1628)进士，曾官礼部给事中。胡友信曾孙胡渭，一代历史地理学大家，著有《禹贡锥指》。胡友信玄孙胡会恩，高中清康熙十五年(1676)榜眼，官至刑部尚书，以勤慎著称。胡友信来孙胡彦颖，清康熙五十四年(1715)进士，曾官翰林院编修，为德清清溪书院首任掌教。

清康熙帝曾问及胡会恩家世，胡会恩以高祖胡友信答对。康熙帝即御书“名文实政”四大字赐之，俾额宗祠，以光闾里。胡会恩有《锥指纪恩》专记此事，并述家史：“臣会恩先世恒为士，自高祖友信以明隆庆间进士起家，为顺德令，政绩茂著，粤人至今尸祝，而文章为世所宗，与归太仆有光齐名。嗣后，科第蝉联。臣父前进士给事中麟生，今诰赠兵部左侍郎者，其文章亦饶有家法。太学生胡渭，臣父之再从弟，而臣会恩同高祖之叔父也，叔祖前甲子举人公角，即世叔之父。渭以孤童攻制义，苦心钻研，寒暑不辍，臣父夙器之，谓其技必售，命臣从讲肆受业焉……”

嘉兴秀水文庙里的小学

◎ 史海钩沉 □ 周维强

我所读的小学——嘉兴县建设中心小学一分部(今嘉兴市实验小学前身之一)校园及其建筑，有一部分是属于早先的秀水县文庙的。文庙也即孔庙。

嘉兴旧有一府两县三文庙。一府即嘉兴府，两县是嘉兴府属的嘉兴县和秀水县。民国前嘉兴同时有三座文庙，分属嘉兴府、嘉兴县和秀水县。秀水县是明宣德五年(1430)从嘉兴县里分出来的，嘉兴县辖嘉兴城东南各乡，秀水县辖嘉兴城西北各乡。一府两县的官衙都在嘉兴城内，这样嘉兴一座城里就有了三座文庙。三座文庙的位置比较集中，呈“品”字形，“品”字上“口”，即北边的是秀水县文庙，建在张家弄(今勤俭路)，文庙东边是东道弄(今少年路)；下面两“口”位置，集街东首县前街上的是嘉兴县文庙，集街西首天官牌楼上的是嘉兴府文庙。集街即现在的中山东路。自唐高宗以后直至清末废科举兴学堂，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“庙学合一”的教育规制，持续1300年，文庙所在也就是官立学校所在。嘉兴一个城里就有了一所府学和两县县学。

本文只说秀水县文庙。据万历《秀水县志》卷二记载，秀水县文庙建有明伦堂、大成殿、两庑、两斋、棂星门及戟门。明伦堂是讲学之所；两庑是大成殿下两边的走廊、房屋；两斋是学习和用膳的地方；棂星即文曲星，棂星门是文庙的正南门；戟门是大成殿的前门，即大成门。入民国后，秀水县文庙曾被辟为国货陈列馆，明伦堂也曾被用来放电影。

我读小学时，秀水县文庙的一部分被划入我所读的学校。学校的正门朝南，开在东西走向的勤俭路上，面对正门的是学校操场及操场北面的一排带走廊的新式建筑校舍。操场北面正中连着校舍走廊是一个半米高、五六平方米的“司令台”。操场有两个篮球架，操场东边是一排乒乓球室，放着两张乒乓球桌。操场东南角是一个用于跳远、跳高的沙坑，沙坑往东三四米是学校的公共厕所。操场西南角是一排水槽和自来水龙头，带走廊的新式建筑校舍，最西面一间是教师的大办公室，办公室东面四间是教室。走廊向西延伸至校园西部，这西面的校园，就是被划进来的文庙大成殿及两庑。两庑的东面这一庑

隔成了校园东西两部分。两庑是东西相对，改为了教室，东庑有三间教室，西庑是四间教室。西庑南面三间教室和北面一间教室之间是一个通道，通道往西又是一个园子，里面还有一个公共厕所。学校的后门在新式建筑校舍的北边，后门出去是一条东西向的铺了大石板的无名路，西面通向县图书馆大门，东面通向少年路。少年路南北走向，建设中心小学的本部在少年路的北端。本部和一分部直线距离千米左右。

那时大成殿已经拆除，大成殿所在位置明显高于两庑之间的空地，这空地栽种了大树，也是西边校园里操场的一部分，西边校园操场的另一部分就是拆除了大成殿的空地，大石头铺成的地面，平平坦坦，完好无损。西操场上有两个水泥做的乒乓球桌。大成殿里供奉孔子塑像的高台被保留，成了西边校园操场的“司令台”。“司令台”后面的一堵墙，隔开了学校和县图书馆。

我是1971年春季入学的，后来春季班改为秋季班，五年级毕业再多读了一个学期，这样小学就读了五年半。那个时候，“十年动乱”到了后期，在我们嘉兴城里，学校教育从幼儿园到中学已经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。小学里语文、算术、唱歌、图画、体育(课表写的是“军体”)各科都正常开了出来。“老九”也不觉着“臭”，“师道”依然“尊严”。在学生和老师的心目中，老师是有威信的。成绩好的学生无论校内校外，都拥有无可置疑的地位。“黄师”“张铁生”热闹过一阵，但在我们学校的学生里仿佛波澜不惊，没起一丁点浪花。现在想来，这恐怕也是嘉兴的一个传统了：一座城有三座文庙，这在当年也是被传为嘉兴人崇文的美谈了。

这也令我会想嘉兴人是什么样的呢？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有一个速写，饶有趣味。1918年，谷崎润一郎初访中国。这一年11月，从上海坐火车去杭州游玩。谷崎润一郎用半通不通的上海话问邻座的一位男子。这位男子正用象牙烟嘴吸着“西敏寺”牌纸烟，懒洋洋地回答谷崎润一郎关于杭州住宿的提问，说杭州没有洋人开的旅馆，“但有中国人开的干净而挺不错的旅馆。装潢设施都一如西式的旅馆，所以从上海来的洋人也都在这儿住。”这个男子还举出了西湖边新开的新新旅馆、清泰旅馆，“新新旅馆规模很大，望出去

景色也好”。这个男子显然有钱，常外出住旅馆，而且住的都是好旅馆。他回答了问题，然后“用爱理不理的目光瞥了谷崎润一郎一眼”，“随后又悠然抽起烟来”。谷崎润一郎问这位男子哪里下车，男子答“嘉兴”。谷崎润一郎在这篇《西湖之月》的文章里写道：“大概这个人是嘉兴的商人吧。硕大肥胖的身躯上穿着亮闪闪的黑缎子衣服，显得颇有派头，稍稍有些傲慢的神情，留着稀疏胡须的嘴角及脸庞的轮廓，看上去总觉得和前总统黎元洪颇为相像。”谷崎润一郎坐的是二等车厢，但他的观察是，在南方二等车内坐的乘客也是“穿戴得相当体面，这在北方惟有一等车内才能见到”。

谷崎润一郎写这个嘉兴商人，着墨不多，却颇得嘉兴人“神韵”，富足、悠然甚至有些爱理不理，见过世面，也乐于回答人的问题，但也不是弄弄，说清楚即不再多说。嘉兴人里可能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这样的特点。谷崎润一郎写的这篇散文发表在日本《改造》杂志1919年6月号上。做过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、《浙江学刊》总编辑的卢敦基先生，20年前给我的《书林意境》写的书评里则说：“我已十多年未去嘉兴，却越来越喜欢嘉兴人。他们一般都认为自己的家乡最好，不愿到外边去工作。他们生活宽裕，态度雍容，出言和缓，一句话，有些贵族气……”有这样特点的人，大概不太容易走极端，这也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那时学校教育能够很快恢复正常了。

秀水县文庙的明伦堂，我读书时是县图书馆阅览室，一直到我考上大学离开嘉兴，明伦堂还是属于图书馆的。高中时，父亲给我在县图书馆办了借书卡，借来看过的有胡云翼的《宋词选》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竖排的朱生豪翻译《莎士比亚戏剧集》等书。明伦堂后来成为嘉兴市文保单位，也是三座文庙硕果仅存的建筑了。

嘉兴县建设中心小学包括一分部，1987年3月更名为嘉兴市实验小学。有的文章把我小学那时的建设中心小学一分部叫做少年路小学。但我确实记得我读书时，学校正门挂的牌子上写的是嘉兴市建设中心小学一分部。我接到北师大录取通知书后，还到小学去看过那时仍居住在学校里的两位班主任王老师和吴老师。

◎ 史林偶拾

□ 唐宝民

老辈学人即使在困顿中，也能培养出生活的情趣来：画家郁风文革期间被关押在秦城监狱，只能透过狭窄的窗户仰望天空。有一天，在放风的时候，她偷偷抓了一把草，放到口袋里，带回房间后，放在肥皂盒里养，小草便一天天长大了。她又找到了一些带上的青苔，把它们和小草放在一起。又用小纸做了一个小蒙古包，放在肥皂盒里，肥皂盒就变成了她想象中的蒙古大草原。

1959年春天，黄苗子被打成“右派分子”，从北京发配到北大荒伐木，那里的条件极其艰苦，但再艰苦的环境，也不能泯灭黄苗子对美的追求，1959年5月20日，他给妻子郁风写了这样一封信：“今天是北大荒最好的天气，我今天在路上看到第一朵开了的马兰花，摘下来寄给你。(去年寄到家里的花种种上了没有呀?)云山水库旁一片嫩绿，各种野花已经开始开放……早晚上下班走一小时的路，欣赏朝

□ 冯忠方

张恨水是我国著名的章回小说家。他在40年的创作生涯中，共写了长篇小说130多部，他的作品以小市民及知识分子在旧社会的遭遇为题材，故事情节曲折，人物形象鲜明，深受读者欢迎。

张恨水本名张恨水，安徽潜山县人。很多人奇怪，他为什么别的不恨，偏偏恨水呢？原来，他自幼喜爱古典文学，当他读到南唐后主李煜的词《相见欢》时，颇受启发。李词是：“林花谢了春红，太匆匆。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。胭脂泪，相留醉，几时重。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。”他从这首词中领悟到

□ 王吴军

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，平生为人正直，语言幽默，而且擅长写打油诗。他写的打油诗俗中有雅，雅中有俗，说理透彻，十分耐读。陶行知在美国留学时，曾经和著名学者胡适是同学。有一次，陶行知读到了胡适写的《我们走那条路》一文，胡适在这篇文章中谈到当时的中国有五个“鬼”，即贫穷、疾病、愚昧、贪污和扰乱这五大社会现象，却没有说到当时在中国横行霸道的帝国主义这个最大的“鬼”。

□ 陈思炳

借赌行贿，可以说是“一大发明”。但这个发明权并不在今人而在古人。

南朝宋元嘉时期，彭城王刘义康因权重遭忌被贬，员外散骑侍郎孔昭先想报答刘义康教父之恩，加之自己“愤愤不得志”，便思付着密谋改变。史学家范晔当时是有影响力的人物，孔昭先想拉拢他，但苦于不被他所了解。于是孔就先拉拢范晔的外甥谢综。孔昭先与谢综赌博，故作博艺不精，输财物给他。既与谢综“情意稍款”，又通过谢综引范晔来赌博，故伎重演，前后输给范晔财物甚多。范晔“既利其财宝，又爱其文艺”，终与他结为“莫逆之好”，上了贼船，参与谋反，最后因事泄而招致灭门之祸(《宋史·范晔传》)。在这次差一点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中，借赌行贿起了重要作用，成为史家不可忽略的一笔。

到此后半半个多世纪的隋代，时任安州总管的宇

逆境中的从容心态

晖和晚霞，牧场的牛群有各种的颜色，更增加美丽情调，可惜没有时间和技巧用画面表现。”

“文革”期间，沈从文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一个叫双溪的地方劳动改造，在那样凄苦的境遇下，沈从文却在给亲人的信中写道：“这里周围都是荷花，灿烂极了……”有一天，黄永玉和沈从文一起走过一个小胡同，胡同边有一个厕所，当时厕所里有一人边上厕所边吹笛子，沈从文听后对黄永玉说：“你听，‘弦歌之声不绝于耳’！”还有一回，沈从文和黄永玉在一个胡同里相遇，那时正是“文革”高潮，彼此不能说话，互相看了一眼就匆匆而过，这时，黄永玉听到沈从文头也不回地说：“要从容啊！”

面对风雨，岿然不动；风云在握，宠辱不惊；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拥有了这种心态，就能在风云变幻中保持一份淡定和超然，以博大的心胸面对诸多的人生苦难，让生命拥有风雨后的绚烂，活出一份精彩来。

张恨水何以“恨水”

了光明的可贵，并且特别喜欢最后一句词。于是就在他17岁第一次投稿时，正式署用笔名“恨水”。他取“恨水”二字，意在自勉爱惜光阴，不要让时光像水一样白白流逝。之后当了新闻记者，就以“张恨水”作为正式姓名，直到逝世。

当然，关于他的名字也有种种猜测和传闻，比如有的人说是张先生早年与某女士谈恋爱，追求未果而恨水，所以有此笔名。为此，张恨水在回忆录《我的创作和生活》中谈到：“名字本来是人的一种记号，我也就听其自然，可是直到现在，许多人对我的笔名有种种猜测，尤其是根据《红楼梦》中女人是水做的一说，揣测的最多，其实满不是那回事。”

陶行知的打油诗

读了胡适的这篇文章之后，陶行知感慨很多，觉得胡适的文章写得并不完美。于是，他立即写了一首打油诗给胡适，真诚而明确地指出了他文章中的疏漏。

陶行知的这首打油诗写道：“明于考古，昧于知今，捉住五个小鬼，放走了一个大妖精。”

这首打油诗既肯定了胡适文章的优点，又一针见血地指明了他文章中的最大不足，非常巧妙，非常诚恳，而且立场和观点也非常鲜明，很有说服力，能让人在微笑中接受。

借赌行贿古已有之

文述亦用借赌行贿这一招，拉拢大理寺少卿杨约。隋开皇年间，晋王杨广密谋废太子杨勇而代之，问计于宇文述。宇文述说，能使主上(隋文帝杨坚)改变主意的人，只有杨素；在杨素身边起智囊作用的人，只有他的弟弟杨约。并称自己与杨约是故交，可以与其共谋。杨广大喜，给宇文述准备了足足的金银财宝，供他打点。宇文述多次宴请杨约，并在开怀畅饮之后“共博”，博时每次都假装不胜，把杨广给他的金银财宝输了个干净。杨约所赢既多，于是向宇文述致谢，宇文述这才说：“这都是晋王所赐，让我博公一乐。”杨约大惊，问为什么。宇文述陈述了杨广的意思和自己一番说辞，杨约答应帮忙。杨素对杨约言听计从，自然也同意了(《隋书·宇文述传》)。随后，杨广取代杨勇成为太子，这是一次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，借赌行贿在其中也起了不小的作用。

借赌行贿的招数，于今仍有心怀叵测者袭用，不少贪官就是栽倒在赌桌上。

◎ 老照片

每一幅照片背后，都有一个故事
每一个故事后面，都有一段历史



水运码头运货忙

改革开放初期，我省的公路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求，许多地方的货物运输依赖水运。图为1981年开化县华埠镇船运社货运码头一片繁忙的景象。

照片提供者：江新诗